

第二章 台籍日人的少年蘇東啟（1923-1937）

蘇東啟的一生跨越兩個朝代的高壓統治，本書以3個時期分3章（第二-四章）分別敘述蘇東啟的經歷，以讓讀者能夠了解蘇東啟的國族心路歷程的轉變：被殖民、被次等殖民、當家作主。3個時期的蘇東啟：台籍日人的少年蘇東啟（1923-1937）、中國國族主義者（1938-1950）、台灣國族主義者（1951-至死），分別論述之。

第四章的台灣國族主義者-蘇東啟在1957-1961年的短短5年中，是蘇東啟一生的精華，這5年蘇東啟完全將自己奉獻給台灣這塊土地，視死如歸的為台灣人爭取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這5年期間，蘇東啟是中國民主黨地區負責人（1957-1961）、蘇東啟是縣長候選人（1960）、蘇東啟更是台獨武裝起義者（蘇東啟事件，1960-1961）。第四章是本書的精華所在，如果讀者時間有限，可以直接閱讀，但若想進一步了解一個人終生信仰的轉折點就請從這一章開始。

第一節 日治台時期

歷史是連續不斷的發展，上一代台灣人有人出生在清朝，卻活躍於日治時代；有人出生在日治時代，卻活躍於國民黨時代，跨越兩個時代是上一代台灣人常有的現象。因此觀察上一代史實需跨越時代，尤其清、日和國民黨時代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相距甚遠，受其統治的人民自然會產生認知的差距[1]。蘇東啟從日本殖民到國民黨統治跨越兩個時代，從無法選擇的台籍日人到企思改變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又因一再失望而燃起台灣國族主義者，要敘述其對人民、土地和國家價值觀的改變，就必須跨越兩個時代來看蘇東啟的妥協與反抗、肯定與否定，才能窺其國族認同的心理掙扎和痛苦，才能了解其能行常人所不能之行動力。

十七世紀荷蘭人來台，經營稻米、砂糖、鹿皮等外銷轉口貿易，台灣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角色，台灣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有別於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1662年鄭成功攻取台灣的依據：「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10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到鄭經時代，英國在台南設商務代辦，台灣砂糖銷到英國。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指出：「我（清）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1860年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台灣正式開港通商，台灣的煤礦、硫磺、砂糖、樟腦與茶葉貿易蒸蒸日上，因而更引起其他列強覬覦，1874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和1884年（法軍利用清法戰爭入侵北台灣

和澎湖），清國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當時全清國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電力公司，第一條架設電報線，都在台灣出現。1895年清國在甲午戰爭戰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長達51年（1895-1945）[2]。

每個人對自己的出生地總帶著一份鄉土情懷的感情。漢人渡海到台後，對辛苦耕耘、安身立命地，自然有份認同和感情，所以，都以生活的地方稱呼自己，如府城人、台北人、彰化人等，從台灣各地區的認同而轉變成全台灣的認同，是在日治時期[3]。日本治台51年期間（19個總督）可分三期，前期武官總督時代，以鎮壓台灣人和番人的武力抵抗為主要任務，同時要奠定開發台灣的基礎。中期文官總督時代，是為了應付台灣人取代武力抵抗而崛起的政治運動，要求比照日本國內的政黨政治。後期武官總督時代，為因應中日戰爭擴展為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把台灣當作南方作戰基地，進行整備[4]。蘇東啟出生於1923年11月26日的台灣台南州北港郡北港街，當時台灣人的身份為日本台灣籍民，「台灣籍民」係日本人指「在日本支配下的台灣本島人」，而有「本島（台灣）」和「內地（日本）」的分別，「台灣人」這個名稱可說是日本人「創造」出來，用來區別本國人和殖民地人的不同[5]。蘇東啟少年在台灣의 成長期，正是台灣知識份子反殖民運動的高峰期。

台灣從1920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及日本「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抗日社會運動。尤其在1925年日本國會通過普選法，給了台灣政治運動者很大鼓勵。1920年代正處於日治台的中期文官總督時代，台灣島內「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共產黨」等團體組織出現，各式請願活動蓬勃發展，如同為雲林北港人的蔡培火，1923年2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協助推動第三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請願團一群人浩浩蕩蕩前往東京，引起台灣總督府不滿，年底這批人遭大規模搜索、扣押和起訴，其中蔡培火被判刑四個月，史稱「治警事件」。1927年蔡培火與蔣渭水共組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都曾在北港成立過報社和支部。當時殖民地知識份子最重要的訴求是一「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台灣は台灣人の台灣ならざるべからず）」[6]，這些都是當時在雲林北港地方鄉親飯後茶餘的話題。

第二節 小學時期

父親-蘇老居與母親-許闖在事業與家庭兩方面都治理的很成功，蘇老居在北港牛稠腳、樹仔腳擁有一百多甲土地，在水林、口湖有近五十甲土地，可謂

富甲一方；蘇東啟兄弟九人，有五人被送到日本讀書，這在當時的鄉下是很不得了的事[7]。蘇東啟的四女蘇勳璧說：爸爸自幼聰穎，在北港南陽公學校就讀，成績非常優異。但是，在學校時常發生日本老師過度體罰台籍學生，或日本學生欺凌台籍學生等情事，蘇東啟早年即有俠義勇敢的膽量，展現領袖氣質，組織一群台籍學生，即使非同班同學有難，亦為其出頭解危，蘇東啟說：「我就伙同一些體格好膽子大的台籍學生，對意識過分偏差的日本老師「蓋布袋（從背後蓋上麻袋）」，…。」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民族自決」主張，在全球掀起一波民族自決主義浪潮；包括在亞洲朝鮮的三一事件與中國的五四運動，都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當然此浪潮也影響到日本帝國調整其殖民地經營方向，1925 年日本本土普選運動成功，國會通過普選法，日本為順應民族主義的浪潮，也允准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台灣人民開始有選舉權，但是規定州市街庄議員一半官派一半民選，官派的大多為是日本人，要年滿 25 歲以上的男子，且須繳納市街庄稅年額 5 圓以上才有投票權（日本本國人人都有選舉參政權，與日本本國相比相差甚多）。在竹中信子著作的日治台生活史中[8]，曾有描述台灣首次地方自治的市州議會情形：1937 年全島（台灣）市州議員座談會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共有 86 名議員參加，齊呼「台灣地方自治制萬歲」。在臨時各州議會及市議會上，本島議員充滿幹勁，針對長年累積下來的內（日本）、台差別待遇提出不滿，緊張的氣氛瀰漫全場。在台北州議會，本島議員質詢：「內、台人考績與年終不同的理由為何？」。內地議員只得面露難色。在不易統治的台中州，特別是本島人具壓倒性勢力的彰化市議會上，預算遭到強烈抨擊。本島議員反對或部份議員退席抗議，造成議會停擺。贊成、反對兩派就像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別。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出現分界的情形日多，由此可見島內的嚴重問題[8]。早期台灣人多維持大家族式生活方式，蘇東啟的祖父生二子，家族二大房共 2、30 多人，眷屬分居在舊式三合院的大宅中，蘇東啟的大伯（蘇石頭）和五哥（蘇東賢）在日治時期至一戰後均擔任里長保正[9]，使著蘇東啟從小在大家族下生活，也就耳聞略知地方自治的初級運作。

台灣本就是稻米、砂糖、茶葉、樟腦等各項重要作物產地，1899 年日本頒布關稅法，建立關稅壁壘，來切斷台灣與港廈的商業往來，且禁止台灣人設立公司組織，轉由日本全面壟斷。所有生產及金融機關都掌控在日本人手裡，重要實業都由三井、三菱等日本大財團包辦壟斷，甚至菸酒專賣品以及公營事業產品的販售，都是日本人的特權。以製糖業來說，製糖為台灣最主要的代表性企業，自 1900 年創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開始，日本人由台灣農民手中攫取 5 萬餘甲耕地，強制收購甘蔗，由日人自訂價格，在台灣有句俗語說：「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來反映日治時期日本資本家掌控的製糖會社壓榨下的無奈

心情[10]。日治時期，蘇東啟的父親（蘇老居）和大伯（蘇石頭）努力種稻與種蔗，大伯還擔任甘蔗委員，蘇東啟的父親和大伯努力種蔗，曾獲得日本政府頒發蔗魁的獎牌及獎金[9]。蘇東啟少年時就常聽父親和大人們痛罵「第一慫，種甘蔗乎會社磅」，被殖民蔗農的無奈心境，蘇東啟少年時即有體會。

日治時期對台灣人民差別待遇處甚多甚廣，如在人事方面：政府機關和學校的首長及重要位置多由日本人擔任，並且同等級的人員日籍比台籍每月多出五、六倍的薪水；在工人方面待遇差額更大，根據 1922 年資料顯示：木工日人三元五角，台人一元八角；建築工日人 4 元，台人 2 元；印刷檢字工日人 2 元 2 角，台人一元。如在賦稅方面：日治末期，台灣人要負擔的稅捐種類高達 54 種（國稅 34 種，州稅 7 種，市街庄稅 12 種），根據統計台灣人負擔的稅額，自 1920 年至 1931 年，每人每年需負擔 10 元以上（其中在 1921 年竟高達 13.119 元）[11]。

日治初期，報紙可有日漢文並存版面，學習日文採鼓勵方式，但日本深怕台灣人民與對岸中國相互勾結，也早為計畫侵略中國做準備。1896 年起，日在台陸續設立「國語」（日語）傳習所、「國語」學校[13]。1937 年開始禁止台灣中文版的報紙，並決定在台灣全面廢止漢文教育，加強言論管制。日治初期，台灣人只能接受初等教育，中等、高等教育嚴格限制台灣人自由升學（1899 年設立醫學校，培養台籍醫師，以補醫師人力不足；1915 年前僅一家師範學校可收台籍學生），1915 年後才創設多所中等、高等學校讓台籍學生就讀，但多以技術教育為目的，且台籍學生錄取率很低；因台人受教育機會不多，且各級教育欠缺完備，導致台人諸多不滿。

以上種種的不平等待遇直到日本政府改採同化政策後情況方有改善。1919 年 1 月 4 日頒布「台灣教育令」，正式在台灣建立完整的教育體制體系，1922 年 2 月又頒布新「台灣教育令」，明定中等以上學校（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實施所謂的「內台共學」，因其認為內台共學是同化台灣人的最佳途徑[12]。1943 年台灣開始實施義務教育，本島人就學率平均 89.21%（男性 93.39%，女性 84.75%）[13]。雖然台灣人在爭取教育過程受到歧視，但是，台灣人也透過新式現代化的教育，吸收近代西方的新觀念、新思維及新技術，過去一些中國傳統的陋習，如不注動衛生、不守時間、不守信用等壞習慣，也透過教育而有了相當大的改變。日治時期在政治上劃分為日本人和台灣人不同階級，在經濟上劃分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二種階級，只有在教育上，由奴化教育走向同化教育。蘇東啟也在「內台共學」的制度下，就讀北港公學校，接受日本教育。

1937年7月7日爆發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後，讓日本朝野轉向戰爭體質，偏激文章、加大標題充斥報紙版面報導戰爭的發展。在竹中信子著作的日治台生活史中[13]，曾對當時台灣社會有如下描述：相對於內地人一致捐款、「齊心協力」為軍隊效勞，本島人（台灣人）社會之複雜有如馬賽克，讓人感到裂痕更加深刻。有比內地人更大聲呼籲愛國的行動派，有以血書申請前往戰地的志願者，有人為了抗日前往大陸，也有人在島內講述抗日政策，有人像貝殼一樣將心封閉起來。日本為防止本島人受島外流言蜚語影響而輕舉妄動，收音機竟然以福州話播報新聞（85%台灣人使用福州話），為的是傳達：「身為帝國臣民，不要誤入歧途。」。可見當時台灣社會的分歧和緊張狀況。因為，根據1940年國勢調查，日本人口有7311萬4308，外地（台灣、朝鮮、庫頁島）有3211萬1793，合計1億522萬6101，日本人口首度突破1億人，但是，三分之一為外地人[14]。1937年蘇東啟正值15歲的少年時期，看到中日戰爭爆發時，台灣社會的氛圍轉變，不久，蘇東啟就到日本就讀關東中學。

台灣社會當時對日本統治的分歧狀況，還可從以下在〈台日〉報紙1939年的「明信片隨筆」專欄中看出端倪：「廢止本島人的寺廟、設立神社一事，彷彿是強迫人吃下他們討厭的大餐，即使那份大餐具高熱量或含有豐富維他命，造成的結果還是一樣吧！」；「打著內台一致的口號，形式上一個勁的模仿內地，反而會感到拘束。應該建立一個能順應台灣風土的生活方式，等忘掉內地、體會在台生活的美好時，才能達到真正的內台一致。」；「以往都會對內地來的觀光客介紹：這是大龍峒表彰貞節婦女的牌坊，並站在表示家有舉人的旗竿前，說明高掛正廳「文魁」三字的意義。但到了一月下旬，一如往例地導覽時，卻發現石碑和旗竿因為會造成交通阻礙，被拔除放置在附近的廣場上。這些內地沒有而台灣特有的東西……。」；「台灣的俳句詩人請作屬於台灣的俳句吧，不需要迎合內地。台灣這塊土地不是有那盤根錯節的榕樹、鳴叫的壁虎、椰子樹林立的港口嗎？不也有被群蚊包圍的門松嗎？沒有必要因為內地評選人無法瞭解等理由，就苦吟桌上的櫻花、蓮彩。」；「住在台灣40年了，卻沒看過所謂的台灣料理，也沒有日本廚師創作的台灣特色料理，這到底是為什麼呢？不應該總是以內地料理為主流。嚐試做出屬於台灣的新菜色來吧！」[15]。

日本朝野轉向戰爭體質後，台灣無可避免成為日本兵員之來源、日軍之轉運站，當然也成為軍事用品及生活農產品之供應站。1938年在台灣成立台灣農業義勇團，並在台灣總督府前，誓師出擊，誓為台灣農產品增加產量而努力，在盟軍還未轟炸台灣之前，台灣農產品成長率已高達2到3倍；日本人八田與一所設計建造之嘉南大圳及烏山頭水庫，對此貢獻功不可沒，嘉南平原成為糧食供應之最重要基地；為供應飛機燃料、發動機潤滑劑與軍用油，甘蔗（可提煉酒精）與蔥麻（可分裂潤滑劑及軍用油）被大量種植。除增加稻米外，甘

薯、樹薯與玉米種植處處可見，阿里山大塊木材不斷被濫砍濫伐，並由阿里山鐵道運送到嘉義，再轉運日本（阿里山鐵道建於 1910 年，1920 年全線通車）；土地極速被大量濫墾，溪埔、山下與丘陵地帶沒有一處倖免[16]。

蘇東啟從北港公學校畢業，並在母親許闖鼓勵下負笈日本就讀東京關東中學，蘇東啟初到東京，看到東京現代化的進步，東京與台灣不論在政治、經濟、教育和基礎建設都有頗大差距，在心中更加印證：日本只是將台灣視為殖民地來掠奪資源。

第二章註釋：

- [1] 張炎憲，〈國家建構與日治台灣史研究〉，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en/guojiajiangouyurizhitaiwanshiyanjiu>。
- [2] 李筱峰，〈二二八前後中國知識人的見證〉，玉山出版社，2020年，頁12-15。
- [3] 張炎憲，〈國家建構與日治台灣史研究〉，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en/guojiajiangouyurizhitaiwanshiyanjiu>。
- [4]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出版社，2018年9月再版一刷，頁146-148。
- [5] 黃國昌，〈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出版社，1993年，頁56。
- [6] 周婉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台灣史料研究期刊第37期，2011年6月，頁16-29，<http://140.112.142.79/teacher/upload/201106.pdf>。
- [7] 林崇熙、廖世冠、劉明俊、蔡金鼎，〈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雲林蘇家傳記〉，玉山出版社，2011年9月15日，頁30-32。
- [8]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編 1926-1945）下〉，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12-13。
- [9] 林崇熙、廖世冠、劉明俊、蔡金鼎，〈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雲林蘇家傳記〉，玉山出版社，2011年9月15日，頁30。
- [10]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上〉〉，玉山出版社，1999年，頁145。
- [11] 王思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圖書出版社，1980年，頁51。
- [12] 台灣省文獻會，〈台灣史〉，台北：眾文圖書出版社，1993年，頁499頁，126-127。
- [13]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編 1926-1945）下〉，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5，293-294。
- [14]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編 1926-1945）下〉，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5，210。
- [15]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編 1926-1945）下〉，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108-110。
- [16] 紀展南，〈嘉義媽祖婆-許世賢傳奇〉，張進通許世賢基金會出版，2007年，頁62。